

见证抗美援朝的纪念章



这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浙江省杭州市分会发行的和平纪念章，铜质，大圆形，底色为大红色，外圈镶金边。红色而圆满，寓意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世界和平的必定实现。正面中央有一只展翅向东高飞的金色和平鸽，象征着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期待和向往。和平鸽下方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浙江省杭州市分会”，徽章两边以对称的谷穗相围，象征革命胜利的累累果实。纪念章背面无文字和图案，但有别针。

1950年10月8日，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了出兵朝鲜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投入抗美援朝的伟大战斗。10月26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合并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对全国各阶层广大群众广泛开展反对美国侵略的思想教育，动员全国人民积极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回国，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胜利完成使命结束活动。

（据《联谊报》）

清代三镶玉如意



该玉如意长约47厘米，首、腹、尾三处镶嵌白玉，严丝合缝，与紫檀浑然一体，并镂雕凤凰、牡丹纹饰，线条流畅灵动，栩栩如生。

据介绍，此件三镶玉如意造型雍容端庄，雕工精湛圆润，为清乾隆玉如意形制的典范。（据《侨乡科技报》）

龙凤虎纹绣罗单衣袖



1982年出土于江陵马山1号墓的战国龙凤虎纹绣罗单衣袖为灰白色罗绣地，绣线可见红棕、黄绿、土黄、橘红、黑、灰色，其中心纹样为龙、凤、虎。

纹样中的一侧是一只顶冠凤鸟，作跳跃状，双翅张开，脚踏小龙。小龙无角，头作三角形。另一侧是一只满身布红黑长纹的斑斓猛虎，张牙舞爪朝前方奔逐大龙。大龙作抵御状。

目前，这件藏于荆州博物馆的战国龙凤虎纹绣罗单衣袖的领和袖缘用大菱形纹锦，大菱形内填以中、小菱形纹、杯形纹、“工”字形纹、曲折纹、回形等纹样。外锦缘和下摆用另一型大菱形纹锦，大菱形内填以深红、土黄色小三角形，或对角，或对底，以及杯形纹、“工”字形纹、曲折纹等纹样。

这件“罗”衣袖薄如蝉翼、工艺复杂。纹样中凤处在主体位置，体现出楚文化中对凤鸟的崇拜。（据《人民政协报》）

孩儿枕墨床欣赏



这件“孩儿枕墨床”，长11厘米，宽4厘米，高5.5厘米。质地紫砂，通体施灰色釉，釉层均匀，青绿、棕红二色画面。外形为一儿童俯伏于枕座之上，只见他抱拢双臂，头向右侧稍稍抬起，脑门宽阔，两耳肥大，眉毛高挑，鼻子挺翘，嘴巴小巧。背部画了一株盛开的荷花，身子两侧与腰部画了一些花草，整体和谐美观，有一种稚朴天真的童趣。

孩儿枕纹样丰富多彩，出现最多的纹饰是动植物纹、人物纹、山水花草纹、文字纹等。我收藏的这个墨床以孩儿枕为题材，让“工作”的墨锭有了“歇息”之所。

（据《新民晚报》）

鱼儿“游”在器物上

鱼纹的形态历经了从最初简易画法到后期细致临摹的漫长历史演变。目前，发现鱼纹陶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20余处。这一时期的鱼纹大多数为压印纹和刻划纹，线条简易，装饰在器物显而易见的位置。鱼纹最早出现于河姆渡文化中，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最为丰富，且作为图腾与先民的原始崇拜有关。比如陕西省西安市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人面鱼纹盆、河南省临汝县（今属汝州市）出土的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甘肃省甘谷县西坪遗址出土的人面鲵鱼彩陶罐，都展示了人类生活与鱼的密切关系，反映出古人对鱼的喜爱和崇拜。

商周时期，青铜器是象征等级地位的标志性礼器，其主要纹饰为兽面纹，鱼纹从仰韶文化的主要崇拜变成了次级崇拜。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依然能看到鱼的形象，鱼纹以辅助纹饰的角色出现在青铜器上，无论是卷尾龙还是衔尾龙，常伴有鱼纹，且大多数位于器物的内侧。其中，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青铜器窖藏出土的西周青铜鲤鱼尊颇为特殊，此尊为鲤鱼形，鱼身肥硕但比例协调，腹内中空，鱼口微启，鱼背部有长方盖，洒水可从此处注入腹内。

从唐代开始，陶瓷器上出现了象征吉祥的鱼纹，其写实的艺术风格与唐代人对丰腴美感的认可相呼应。流畅的线条、饱满的形态，再加上有所创新的鱼形象，展现了当时的艺术特色。至宋代，多种陶瓷制作技法盛行，各大名窑的装饰艺术“群芳争艳”，鱼纹成为受欢迎的陶瓷装饰元素，是各式器物上的“常客”。其中，装饰鱼藻纹的陶瓷器以景德镇青白釉刻、印花瓷器，耀州窑刻、印花瓷器，吉州窑铁绣花彩绘瓷器等为代表。

元代匠人开始以毛笔在光滑的陶瓷上绘制鱼纹，多使用釉下青花和彩色釉料。这些鱼纹更为生动，背景常伴有水藻、莲花等，增加了画面的趣味性和层次感。明清是中国瓷器发展的鼎盛期，也是鱼纹装饰艺术的高峰。明代鱼纹瓷器种类丰富，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其中青花鱼纹瓷器最具特色。永乐、宣德时期被誉为青花瓷器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鱼纹的色调呈现出幽深、艳丽的特点。清代的鱼纹装饰不仅延续了之前的优秀传统，而且在品种、数量、组合等方面有所突破。据记载，故宫博物院收藏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鱼纹瓷器分别是90、41、36件，可见这一时期鱼纹应用之广。



新石器时代的人面鱼纹彩陶盆。



新石器时代的鹳鱼石斧图彩陶缸。

年年有“鱼”的美好寓意

汉代以后，神话传说中的“鱼神”逐渐从神位走向民间，广泛应用于木雕、玉雕、瓷器、刺绣、壁画、剪纸等方面。然而，无论是单纹还是组合纹，都带有明显的装饰性和吉祥寓意。鱼代表的子孙繁衍、爱情美满等寓意逐步普及。

鱼，一般象征着多产、多福，中国民间文化中有“年年有余（鱼）”“吉庆有余（鱼）”“富贵有余（鱼）”等说法。人们将鱼的图案描绘于各种器物之上，寄托对丰收、吉祥、美好的憧憬，鱼纹自然而然成为一种代表祥瑞的文化符号。在海南的黎锦上，鱼纹、水波纹是较为常见的纹样。黎锦上的鱼纹多由菱形和直线组成，具有抽象的艺术美感。海南岛中西部黎族聚居区河网密布，鱼与黎族先民的生活关联密切，织娘凭借一双巧手和简单的工具，将鱼的形象呈现于黎锦上，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纵观鱼纹的发展史，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审美意识演变的历史。可以说，鱼纹在不断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在绘制工艺方面，鱼纹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平面到立体、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过程。然而，不变的是，鱼纹始终深植于民间艺术的肥沃土壤之中，从史前的图腾崇拜，到现代的吉祥象征，鱼纹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内涵，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据《海南日报》）



五代青瓷飞鱼形水盂。

帝乘坐的车称作“辂”，共分5种，分别以装饰物材质命名，按照级别高低依次为：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在宋代《卤簿玉辂图》展柜前，数字投影再现了气势磅礴的皇家仪仗队伍，语音解说向观众介绍相关知识。

此次展览通过多媒体、虚拟现实、艺术装置等手段，营造多元化、沉浸式观展体验，让观众深入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身临其境地感受辽金时期文人松下对弈、游牧民族渔猎等场景。

展览期间，辽宁省博物馆举办主题多样的学术讲座和丰富多彩的社教活动，并推出主题文创产品。据悉，展览将持续至2025年1月28日。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鱼纹的历史演变

鱼很早就走进了人类的生活。在新石器时代，鱼纹已经作为一种重要的装饰纹样出现在彩陶上，其发展演变经历了写实鱼纹、典型鱼纹、筒体鱼纹和符号化鱼纹等阶段，虽然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其象征意义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增强。在约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彩陶上，鱼纹出现的频率较高，它是仰韶文化早期的标志性纹样；此后，仰韶文化的鱼纹同样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即写实、抽象，再到原点加两条弧线的样式。

商周时期，鱼类图案进一步发展演变，不再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几何图案，而是恢复了早期的自然现实主义风格。春秋战国时期的鱼纹更为写实，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思想方面“百家争鸣”，人们开始更加关注社会生活和个人发展，艺术创作更多地聚焦现实生活 and 真实世界。

秦汉时期，鱼类图案发展出更多祈福的含义，这一时期的鱼纹装饰主要出现在画像石、画像砖和瓦当上，趋向于简洁、抽象，后期偏写实。隋唐时期，鱼类图案显著发展，使用更为频繁，风格和类型也更加丰富多彩，并逐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纹饰因此变得更加丰满、大方，常雕饰于铜器、瓷器上。

宋元时期，鱼形装饰在陶瓷和纺织业中广泛应用，人们创造出带有鱼形图案的鱼藻锦。明代以后，鱼类图案的创造和发展达到了顶峰，其形状精致华丽，且被应用于刺绣的椅披和袍服上，寓意和表现形式也进一步丰富。至清代，民间瓷器上亦随处可见鱼纹图案，它们出现在瓷瓶、罐、盘、碗、杯、盒等器物上，造型自然流畅，艺术感很强，少数独立构成图案，大多与其他纹饰组合构图，常与水草、水藻、莲花、牡丹、水波、蝙蝠、龙、八宝、钱等图案一起出现。与此同时，年画在明末清初十分流行，出现了大量以鱼为主题的年画。



►明嘉靖五彩鱼藻纹盖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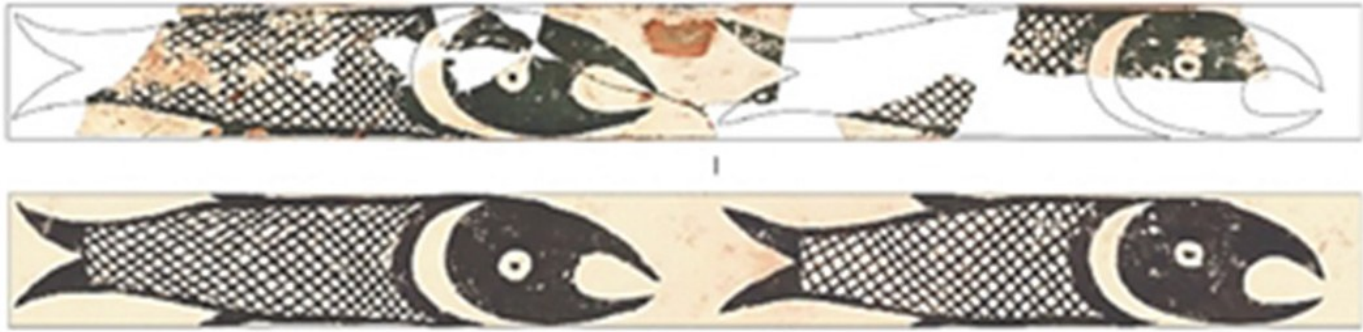
鱼纹

近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消息，山西运城市夏县崔家河遗址出土了一件罕见的彩陶鱼纹盆。该遗址属于距今5000余年的仰韶中期庙底沟文化。鱼纹，是中国传统纹饰中最古老和较为常见的纹饰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至今已有6000年的历史传承。它不仅是中国民间的吉祥图案，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周青铜鲤鱼尊。

从史前图腾到吉祥象征



山西运城崔家河遗址出土的彩陶鱼纹盆上的鱼纹(上)及复原图(下)。

赴一场辽金历史文化盛宴



辽代波斯玻璃瓶。

在辽宁省博物馆“山河与共——辽金历史文化主题文物展”现场，一个精美的辽代玻璃瓶吸引不少观众驻足欣赏。此瓶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北塔，轻薄剔透，瓶口似鸟首，柄柱似鸟尾，整体犹如一只昂首蹲坐的小鸟，瓶中还有一长颈弧腹小瓶，设计十分巧妙。据介绍，这件玻璃瓶产自波斯（今伊朗），反映了辽与西亚的经贸文化交流。

“山河与共——辽金历史文化主题文物展”是辽宁省首次以主题文物展的形式展示辽金历史文化，由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辽宁省文物局、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办，辽宁省博物馆、首都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山西博物院、内蒙古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院、黑龙江省博物院、河南博物院承办，省内外22家文博单位协办。

展览分为“初兴风土：契丹女真的文化起源与特色”“学唐比宋：辽金对中原文化的继承和吸纳”“南北同风：多民族的共生与发展”“文脉一统：多元文化的融聚与统一”四部分，共展出文物454件（组），其中一级文物124件（组），品类丰富，包含医巫闾山遗

址群、辽上京城、耶律羽之墓、陈国公主墓、新香坊金墓、金中都皇陵等重要的辽金墓葬、遗址出土文物。

辽宁省北票市辽墓出土的飞鱼形青瓷水盂造型生动，做工精湛。此器通体施青釉，外观似一条刚出水的鱼，披鳞展翅，腾空飞起，翅膀和鱼尾上还点缀着水珠。这件瓷器属于耀州窑精品，见证了契丹等北方民族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山西省稷山县马村金墓出土的二十四孝故事陶塑栩栩如生。据介绍，墓葬中年组孝行图的出现大致始于北宋元丰年间，至金代中期最为流行。展览中有不少绘画珍品。《山奔候约图》与《竹雀双兔图》均出土于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辽墓，是国内仅存的两幅辽代墓葬出土绢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瑞鹤图》是宋徽宗赵佶所作绢本设色画，绘画技法精妙，图中群鹤如云似雾，千姿百态，各具特色。金代杨微《二骏图》描绘了女真人驯马的场面，风格浑厚豪放。

“卤簿”之名始于秦汉，是古代帝王出行仪仗、车马及随从人员的总称。皇